

从分科治学到科际融合：“入世式学术” 视野下新文科建设的基本理路

李鹏虎

(深圳大学 广东 深圳 518060)

摘要:高校传统文科建设的突出特征是强调分科治学,表现为以学科知识的内在逻辑结构为基础,注重学科知识体系的逻辑自治性,其将学科结构分离和割裂思维定式和研究倾向给文科的建设与发展带来了诸多挑战。作为一种研究范式,“入世式学术”倡导以回应和解决本土实践中的复杂问题为逻辑起点,在研究过程中与实践者、多学科者、政策制定者等保持互动与合作,共同生产高质量的本土知识体系。新文科建设可适当借鉴“入世式学术”这一范式,以学科交叉探索文科发展的新增长点,提高学术效能并重建文科学术的公共性,关注中国情境以强化文科研究的本土意识等。

关键词:分科治学;科际融合“入世式学术”;新文科建设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2614(2021)11-0007-06

DOI:10.19903/j.cnki.cn23-1074/g.2021.11.002

近年来,伴随国家“双一流”建设的深入推进,“高等教育转型、大学转型、学科转型”等学术话语进入人们的视野,“转型”在短时期内成为促进教育高质量发展的一剂良药。2019年,教育部提出并全面推进的“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建设便旨在推动学科发展的转型。事实上,学科转型既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对高等教育提出的一项新要求,也是在“知识生产模式转型”“知识民主理念兴起”等背景下必然要走的一条发展道路。以新文科建设为例,众所周知,其在构建和创新中国特色学术话语体系、产生新理论和新思想、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等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长期以来,传统文科习以为常的“分科治学”方式以及与之相匹配的制度设计、组织架构、队伍建设等体系使之在发展过程中面临诸多束缚和牵绊,并由此衍生出理论创新不足、疏于价值引领、社会责任意识淡薄等问题,尤其在信息和技术时代,需要重新认识文科对个体及社会的价值和意义。这也是教育部为何发出大力建设新文科倡议并在全国各地高校掀起了新一轮改革热潮的缘由所在。无论如何,新文科建设既是深化高校教育教学改革的重要举措,也是为适应新时代发展而作出的关键抉择。

一、文科的“旧”与“新”

究竟何谓新文科?新文科新在何处?在谈及新文科建

设时,这是首先需要厘清的问题。有关新文科内涵与特征的阐释,近两年学术界进行了诸多探讨,不同学者出于理解角度和自身实践的不同对新文科作出了不同的界定。一种观点认为,新文科的“新”体现在四个方面,即新科技革命与文科的融合化发展、历史新节点与文科新使命、进入新时代与文科中国化、全球新格局和文科国际化^[1]。因此,如何实现“学科发展与国家命运同频共振、理论建设与时代发展息息相关、话语创新与本土化自觉相互促进”成为当下新文科建设过程中需要思考的重要议题^[2]。上述这种理解从宏观的视角,全面阐述了文科转向新型发展道路的时代背景与国家需求。以此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新文科建设担负着宏大且艰巨的使命与责任,人们需要重新认识文科的学科地位及其重要性,以及文科在人才培养乃至推动整个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当然,除了对新文科进行宏大命题以外,还有观点偏向于从细微处出发,聚焦并围绕新文科自身的理论知识体系,进而勾勒并解释新文科“新”在何处。比如,有学者指出,“新交叉、新功能、新范式、新路径”可用于概况新文科的特征^[3]。也有学者认为,新文科的特征主要体现在建设目标现代化、发展模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现代化和质量标准现代化等方面^[4]。除此之外,新文科强调交叉融合性、开放包容性与技术人文性,以求同存异、互鉴共进、协同发展为核心基准^[5]。的确,新文科建设呼应

收稿日期:2021-09-23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青年项目“场域视角下中国一流大学交叉学科建设研究”(编号:CIA210275);广东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专项研究项目“广东省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政策要点与实践机制研究”(编号:2019GXJK176)。

作者简介:李鹏虎,深圳大学湾区教育研究院助理教授,教育学博士,研究方向:高等教育管理。

了知识生产模式的转型。而依照知识生产模式 I 进行自我建构也常常是人们批判“传统文科”故步自封的一种理由,具体表现为“基本固定的学术共同体内部人员、学科的、制度化的知识生产基础,等级制的、同质性的知识生产组织等”^[6]。

在对新文科的内涵和特征进行界定和描述的过程中,学界也尤为关心文科“新”“旧”之间的关系。新文科建设如此火热,对传统文科的发展意味着什么?会颠覆传统文科的发展模式吗?会取代传统文科的地位吗?对此,学界普遍认为,新文科和旧文科并非简单的替代关系或者颠覆关系,而更多展现的则是创新与基础的关系,新文科建设与传统文科的发展脉络是不可割裂的。正如有学者所言“新文科一方面深深根植于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脉络之中,是人文社会科学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自我更新与调适;另一方面,新文科同时也深深根植于外部世界的变化之中,是人文社会科学适应时代发展的必然结果。”^[7]因此,不能简单地用“新文科”替代“旧文科”。传统文科历经长时间的发展与积淀,在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方面也有一定的独特优势。无论如何,“新文科”建设的提出都不应当建立在对传统文科批判甚至替代的基础上,而应当是在传统文科发展的基础上因时制宜,找寻并开辟新增长点。换言之,新文科的“新”是锦上添花之新,而不是破旧立新之新^[8]。同样,新文科更不是对传统文科的否定与颠覆,而是立足于传统文科的发展基础,与时俱进,实现自我转型与自我变革,达成多学科、跨学科、超学科的开放与交流、交叉与交融,建构新的学术共同体和研究平台,培养跨学科的复合型人才^[9]。

众所周知,知识生产方式进入了一个新时代,交叉、融合、协同、合作成为新的发展趋势与特征。在此背景下,传统文科“以学科知识的内在逻辑结构为基础,注重学科知识体系的逻辑自治性,并将学科结构分离和割裂”的发展模式已然不适应社会和时代的需求。与传统文科的发展模式不同,新文科建设试图走出知识愈发精细化、专业化和碎片化的窠臼,代表了知识生产模式转型背景下学科融合发展的一种趋势。这种融合一方面是人文学与科技的融合,即新文科建设要将新技术、新方法、新范式纳入其中,并以新技术、新方法、新范式解决文科自身无法解决的问题,促进文理之间融合发展。同时弥合长期以来文理之间存在裂缝的窘境,以培养具有文理底蕴的综合创新型人才;另一方面,是人文社会科学内部之间的融合,即新文科建设首先要打破人文社会科学内部之间的隔阂与壁垒,回归文史哲的体系化与综合化,既要培养学生的社会科学理论方法和观念认识,也要提升其关注社会现实、勇于承担社会责任意识,并在知识生产和知识运用之间建立新的联系,重建文科学术的公共性。更进一步讲,新文科建设还意味着要把中国社会变革的历史素材作为

观察和研究的对象,以此探索创新具有中国特色的文科学术话语体系,建构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科学理论体系,形成中国社会科学学派,向全球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二、从“分科治学”到“科际融合”:新文科建设的逻辑探寻

从 19 世纪中叶到 20 世纪上半叶,随着市场经济的普及及劳动分工的细化,劳动过程被区分为不同的领域,每个领域成为不同学科的研究对象。科学从一种总体性的研究进入更为细化、实证化的研究,以总体性为取向的哲学理想,在“形而上学”的标签下被放逐了^[10]。20 世纪中期以来,学科有加速分化的趋势,专门学科和专题研究领域越来越多,各学科变得越来越支离破碎。新的学科名称层出不穷,并且均获得了适当的制度性基础,表现为专业学系、专业学术团体、专业期刊以及图书馆的专业分类书目等^[11]。学科分化提高了知识的生产效率,促使知识产量大幅提升,英国技术预测专家詹姆斯·马丁(James Martin)做过一个测算,即“人类知识总量在 19 世纪每 50 年翻一番,20 世纪初大约每 30 年翻一番,50 年代每 10 年翻一番,70 年代每 5 年翻一番,20 世纪末每 3 年翻一番”^[12]。在这种背景下,传统文科也变得愈发精细化,潜在遵循着分科治学的基本方式。而高校作为“生产高深学问的场所”,在多重制度逻辑的作用下,也形成了精细的学科分类,进行着专业化的理论生产。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从事专业研究的学者只能细分彼此的研究专业和研究过程,在各自分得的小块领域中进行研究。可以说,高校传统文科建设的显著特征表现为囿于学科,并以单一学科为逻辑基础,突出学科知识体系的逻辑自治性,呈现出“强学科性、弱交叉性”的基本特征。这造成了文科内部之间、文理之间学科壁垒森严的问题,不仅为文科的进一步发展带来了障碍,导致了知识上的破碎和人才上的单一,还造成了阶层的隔阂与文化的对立,斯诺(C. P. Snow)提出的两种文化便是最好的例证。人们逐步意识到,社会科学面临各种问题,对学科的结构方式从学术上提出了一些异议。社会科学内部也在对学科分化进行着一系列争论,在讨论世界变化的基础上,华勒斯坦等人提出了三个问题:一是各门社会科学之间的区分是否有效;二是社会科学遗产在多大程度上是褊狭的;三是“两种文化”之间的区分是否具有实用性和现实性^[13]。

显然,分科治学的文科模式难以应对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对文科提出的挑战。即便是文科领域的一些复杂问题,也不再是单一学科所能够承担的,而是需要多个学科之间的共同合作。比如,重大的历史考古发现,不仅需要人类学、历史学、语言学、考古学等学科之间的贯通合作,而且要

借助新技术对事件本身展开高效、科学的剖析与研究。事实上,在现实世界中,正是缘于多学科之间的合作与交叉,人文社会科学才有机会快速地发展。世界学术发展的趋势促使学科向“综合化”复归,传统经典学科间的界限被不断打破,学科边界被重新划分,一些交叉学科(如计算法学、人文医学)和多学科的研究领域(如女性研究、城市治理研究)开始大量出现,并且在大学中也逐渐确立了学科的合法性。这预示着学科发展正走向新一轮的“融合”,即在承认学科差异的基础上不断打破学科边界,促进学科间相互渗透与交叉。如此一来,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三分法已经不像它一度显示出的那样不证自明了。同样,社会科学也不再是站在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两个对立的家族之间、不知该投靠哪一方的“亲戚”,它们业已成为自身潜在调和的场所^[14]。在社会科学领域,分化的学科正在朝着科际融合的方向汇合,产生了丰富多样的成果,这正是社会科学对学术发展趋势所作出的反应。

从知识生产的规律来看,寻求科际融合是重整日渐瓦解的人文学科结构的方法。只有当人们能够顺利地跨越各个领域的边界时,才能对真实的世界产生清晰的想法,而不再透过某种意识形态和宗教教条的镜片观看事物或受制于满足迫切需求的短视反应^[15]。单凭学习各学科的片面知识,既无法产生整全的看法,也难以看到事物的全貌。当各种学科间的知识体系融合在一起时,知识的多样性和深度将会增加,这得益于我们在各学科交叉边缘地带能找到更多新的增长点。新文科建设追求科际融合之所以重要,还基于另外一个原因,即提升文科的地位及社会服务能力。众所周知,文科的式微成为全球面临的一个普遍问题。乔·古尔迪和阿米蒂奇指出“最近半个世纪,整个人文学科一直处于危机之中,虽然危机在每个国家的表现有所不同。”^[16]无独有偶,J.康利认为,美国“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社会科学拥有的自信心,到了八十年代已变为绝望”^[17]。利奥塔(Jean-Francois Lyotard)甚至宣称“文科已经死掉”^[18]。文科的衰微纵有诸多缘由,但忽视“现实”、远离“社会”、回避“学术与实践的关系”并遁入不食人间烟火的“象牙塔”中“自产自销”,无疑是导致文科衰微的重要因素之一。新文科建设旨在改善文科日渐衰微的处境,通过科际融合这种“借力”和“借势”的方式,博采众长,将新科学、新技术融入文科发展的战略中,振兴文科,提升其服务社会发展的能力,彰显超越专业目标的现实关怀。

三、“入世式学术”作为新文科建设的一种范式

范式(paradigm)一词由美国著名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提出并在《科学革命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中系统阐述。在库恩看来,范式是一种对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基本承诺,是科学家集团所共同接受的一组假说、理论、准则和方法的总和^[19]。作为一种新的范式,“入世式学术”旨在强调人文社会科学院研究所关注的现实往往是高度复杂的,它不是单个学者或单个理论视角所能解释的。因此,研究者对其在研究中的角色、利益和视角要更加透明且有更多的反思,并且要依照一种“参与式框架”来认识和理解研究主题,这意味着需要融入更多的本地利益相关者——包括实践者及其他学科背景的研究者等^[20]。近十年来,以美国组织管理学家范德文(Van de Ven)为核心的管理学界的有识之士,在全球范围内呼吁和倡议“入世式学术”(Engaged Scholarship),以便生产与实践相关的高质量管理知识。我国学者于2012年开始在国内推介“入世式学术”(又称入世治学或投入型学术研究),并呼吁学界关注本土高质量知识的生产。“入世式学术”之所以能够在社会科学领域内引起人们共鸣,缘于其倡导研究者在直面现实问题时,要充分考虑复杂情境中实践者、多学科者或政策制定者等利益相关者的观点和需求,以某种知情或合作的方式生产一种综合的解释性理论、干预性政策框架或特定行动方案,以更好地解释或解决现实世界的问题^[21]。“入世式学术”主要包括四个环节,分别是问题形成、理论建构、研究设计、问题解决。在研究的每个阶段,研究者可以根据情境需要,引入政策制定者、专家学者、多学科研究人员等不同利益相关者参与到学术研究的活动中,通过协同合作,共同致力于研究问题的有效解决。具体过程可由图1的“钻石模型”体现出来。从问题形成、理论建构、研究设计、问题解决等四个环节的研究参与者来看,“入世式学术”突破了传统意义上局限于学科内“自产自销”式的学术困境,倡导研究者根据实际需要积极引入利益相关者,并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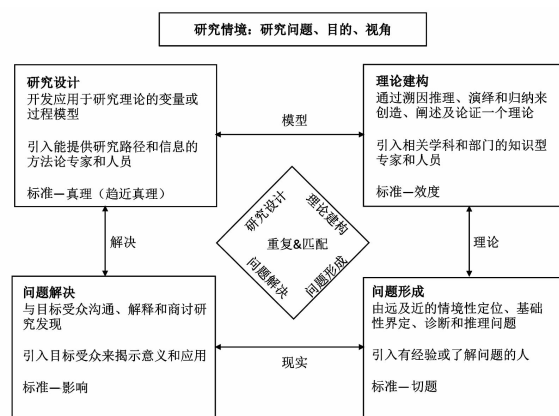


图1 “入世式学术”的钻石模型

资料来源: Van de Ven. Engaged Scholarship: A Guide for Organizational and Social Research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10.

之对话,以合作的方式共同致力于解决本土实践中的重大现实问题。正缘于此,“入世式学术”在突破传统文科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难题和困境存在诸多可能性,不仅可以彰显新文科建设的意义与价值,而且在促成更多的学者关注本土人文社会科学问题、重建文科学术的公共性、构建中国特色人文社会科学理论等方面有诸多优势。

具体而言,“入世式学术”对于新文科建设有着较强的适用性,主要原因有以下三点:第一,新文科建设要求重视学科交叉与融合。从新文科建设的逻辑指向来看,无论是宏观的外部关系或微观的内部结构,新文科建设涉及自然科学领域及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内的诸多学科,需要学科间的相互支持与协作。从某种程度上来看,也只有从新的学科视角对文科建设加以透视与省思,才能比较全面和深入了解新文科的本质、功能和价值。美国希拉姆学院于2017年率先提出“新文科”,着重点便落在对传统文科进行学科重组、文理交叉的基础上,并把新技术融入哲学、文学、语言等课程中。同样,立足我国本土实际的新文科建设亦突出强调文科与理科、工科等学科之间的交叉合作。第二,新文科建设要求关注社会现实问题。众所周知,学术犬儒主义的危害在于把学术局限在自己的小天地里无限精致化甚至诡辩化,直至“升华到一个高不可攀、与现实脱离的程度”^[22]。脱离了对现实问题的关注,纯粹学理层面学术研究难以广泛走进公众的视野,削弱了文科的功能。这些问题有赖于在新文科建设过程中给予关注,充分考虑实践需求,与利益相关者共同努力,在生产知识和现实关怀之间建立新的联系,避免文科领域的学术因为“精致化”和“学院化”而脱离公共事务关怀。第三,新文科要求建构与创新学术理论体系。2016年5月,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面对新形势新要求,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比如,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战略还不十分明确,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水平总体不高,学术原创能力还不强。”^[23]近年来,为了与国际接轨,不少学者刻意迎合西方研究范式与理论,重实证研究而轻理论建构。对于人文社会科学而言,如果学术研究不考虑其“指示性”(表达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对象本土性根源的民族方法术语),那么那些具有重要社会意义的本土研究对象将被低估甚至最终被忽视^[24]。这种现象并不是假设或危言耸听,加拿大经济学家的例子已经证实:在过去的30年里,为了在其领域内顶级期刊上发表论文,这些专家对当地的经济问题逐渐失去了兴趣^[25]。我国社会大变革时代要求文科创新发展,呼唤新文科建设,扎根并取材于中国大地,建构于创新中国特色社会科学力量体系,并实现“价值性、思想性”“知识性、学理性”相统一。

四、“入世式学术”视野下新文科建设的基本理路

新文科建设侧重不同、视角多元,既可以以制度、组织和学科为抓手,分析新文科建设的支撑基础,也可以从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即大学的三大基本职能出发,系统探讨新文科建设的发展之“道”,当然还可以从资源整合、师资队伍建设和专业优化、课程体系等多个角度阐述新文科建设的具体策略。本文借助“入世式学术”这一研究范式,更多关注的是新文科建设中的研究范式转向,并深入探讨学术与现实的关系。“入世式学术”倡导在学术研究的过程中,重视与利益相关者和多学科之间的合作、关注本土情境和社会现实问题、努力建构与创新学术理论体系等。因此,从“入世式学术”这一视野出发,新文科建设应当处理好以下三个关键问题。

1. 重视学科交叉,探索文科发展的新增长点

学科在大学中取得合法性地位已有上百年的历史,发展至今,包括人才培养、学术研究、资源配置等在内的各项大学制度也基本上围绕着学科设计而成。长此以往,大学管理者和一线教师都逐渐适应了建立在学科基础上的组织与制度结构,并且深陷其中。尽管这种结构在特定时期能够促进学科发展,但同时它也使学者间相互孤立,难以与有着共同目标或想法的潜在合作者进行互动。学科领域内的精细分割极大影响着文科学术的发展,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以中国古代史、考古学和古文字学为例,实质上三者之间有着紧密的关联,是一个综合性的知识体系,然而,在现如今大学内部的学科运行实践中,三个学科被人为剥离开来。这带来的结果是:任何一个学科内学术训练都愈发专业化,难以得到其他学科的支撑,以致在许多问题的剖析上,仍然采用陈旧的乃至片面、过时的理论学说,这种方式获取的成果往往经不起推敲,自然也不利于研究的深入推进^[26]。此外,我国历史学家钱乘旦以史学、人类学、考古学等为具体例子,详细阐述了文科交叉发展的必要性与迫切性。他指出:“今天文科的发展已到了一个临界点,若再不通学科界限,那么不仅知识的增加日益不可能,而且连更深入的研究都难以做到。要使文科获得实质发展,以适应时代需要,学科交叉势在必行。”^[27]学科细分的缺点则在于打破了知识的系统性,切断了学科之间的联系。事实上,无论是从古典人文的共同源头,还是从先贤们取得的经典学术成果来看,集大成者皆是利用一切可能的学术资源,而非固守在狭小的学术专业门户。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将文科描述为以“解放”为目的,以批评建设作用为评断标准、以“自由”为其基本价值的反思性知识^[28]。这种解放、批评与自由离不开知识的综

合化,否则只能是蠡酌管窥。总之,新文科建设只有重视学科交叉,才能挖掘文科发展的新增长点。

2. 提高学术效能,重建文科学术的公共性

文以载道,士以弘道。古代文人志士重在探究经世致用之学,北宋张载的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就是对经世致用之学的最好阐释。对于文科而言,做学术的意义除了知识创新以外,还在于知识的公共运用。学术不仅涉及少数学者发现新知识、传播新知识的思想、言论权利,而且还涉及社会公众获得新知识、运用新知识的公民权利^[29]。换言之,新文科建设在学术研究方面要积极回应社会实践^[30],以重建文科学术的公共性。何谓“公共性”?许纪霖先生认为有三层含义:一是面向公众发言的;二是为了公众思考的,即从公共立场和公共利益,而非私人立场、个人利益出发;三是所涉及的通常是公共社会中的公共事务或重大问题^[31]。从学术的演变史来看,学术的个人性与公共性历来是人们热衷探讨的话题。可以说,没有学术的个人性,就缺失了学术研究的特色和个人印记;而没有学术的公共性,学术的社会价值和演变动力便不复存在。学术的个人性与公共性相辅相成、互为促进。令人遗憾的是,在对学术过度量化、指标崇拜、缺乏信任的今天,文科学术公共性的不足抑或学术公共性的衰落成为今天新文科建设过程中面临的重要挑战。“人文知识分子在个体定位上与民众有距离,甚至与整个世俗社会相脱离而趋于隐逸”^[32]。人文知识分子这种“出世”的态度令人忧虑,社会公众对学术的认同感、信任感、崇敬感每况愈下。事实上,作为对生命、公平、价值、精神、担当等话题有普遍关怀的文科,当其学术不能在公共领域公开表现它的社会关怀和社会问题意识时,便失去了其公共性以及应有的责任和使命。在新文科建设过程中,文科学术共同体应在开展专业领域的学术活动之外,将其专业知识应用于公众领域或者自身参与公众活动中,比如,与公众对话、为公众写作、致力于阐释和解决社会公共问题、共同增进社会正义和福祉等。当前,新文科建设只有重建文科学术的公共性,才能实现自我拯救。

3. 关注中国情境,强化文科研究的本土意识

社会学家贺雪峰认为“中国社会科学不建立在全面深刻理解中国历史、中国经验与中国实践的基础上,就无法真正理解中国政策实践……中国社会科学就会变成一帮自言自语的书斋学者们的小众游戏。”^[33]21世纪以来,缘于学术全球化与国际化的发展及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战略需求,重视国际学术发表成为学术发展过程中的一项核心议题。一方面,随着国际青年学术人才的不断引入及高校对“走出去、与国际接轨”的制度安排与物质激励,不少学者转向实证研究,通过使用纷繁复杂的数理统计、理论模型及符合国际发

表的研究范式等策略,以期在国际学术舞台上崭露头角并占有一席之地。得益于此,越来越多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见诸国际权威期刊,使得西方世界有更多机会和平台了解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另一方面,在国际期刊发表的学术论文中,广泛存在西方理论与经验主导的现象,本土学者常采用西方视角来观察与研究自己的社会,面临着外部话语依附及自身话语缺失、盲从西方理论及本土情境失察等诸多挑战。久而久之,人文社会科学学术领域内“将西方价值、理论和范式作为正当性基础”的自我定位与书写典范得以承袭。作为结果,越来越多的实证研究在进行理论框架设计时,或是有意规避或是无意疏忽,不再区分情境无涉(context-free)和情境限定(context-bounded)之间的区别,默认西方理论能够应用于任何情境。实质上,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所发生的巨大变革、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所呈现出来的社会现象,是西方社会不可同日而语的。而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特色愈发体现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中国与西方之所异远胜于所同^[34]。因此,新文科建设的要义应在于,以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为核心内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呈现和包含中国经验、中国材料、中国数据的文科^[35]。这同时要求新文科建设需要将根基置于本土,以自身传统与文化本位的视角体察社会问题,以本土社会关怀为要义从事学术研究工作。在此基础上,彰显本土的语言、符号与文化特质及主体性。

参考文献:

- [1]樊丽明.对“新文科”之“新”的几点理解[J].中国高教研究,2019(10):10.
- [2]张 聪.学科发展的“范式”演变[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10-30(1).
- [3]周 毅,李卓卓.新文科建设的理路与设计[J].中国大学教学,2019(6):52.
- [4]黄炳超.高等教育现代化视域下新文科建设的思考[J].教育理论与实践,2020(18):3-6.
- [5]魏 琛.新文科视域下认知语言研究的五个维度[J].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1):39.
- [6]李鹏虎.知识生产模式转型与高校科研评价改革[J].江苏高教,2020(10):17.
- [7]权培培,段 禹,崔延强.文科之“新”与文科之“道”——关于新文科建设的思考[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1):283.
- [8]陈洪捷.新文科如何从顶层设计到基层实践[N].中国科学报,2020-06-30(7).
- [9]刘曙光.新文科与思维方式、学术创新[J].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4):18.

- [10]仰海峰. 从分化到整合——重申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总体性方法[J]. 浙江社会科学, 2008(1): 10.
- [11][13][14][美]华勒斯坦 等. 开放社会科学——重建社会科学报告书[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7: 51, 39, 50-51.
- [12]丁润生. 无尽的宝藏[M]. 重庆: 重庆出版社, 1988: 342.
- [15][美]爱德华·威尔逊. 知识大融通: 21 世纪的科学与人文学[M].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6: 20.
- [16][美]乔·古尔迪, 大卫·阿米蒂奇. 历史学宣言[M]. 上海: 格致出版社, 2017: 6.
- [17][美]J. 康利. 美国社会科学面临的危机——研究经费的削减和公司的挤入[J]. 戴 侃, 译. 国外社会科学, 1983(11): 24.
- [18][法]让-弗朗索瓦·利奥塔. 后现代性与公正游戏[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8: 86.
- [19][美]托马斯·库恩. 科学革命的结构[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6-10.
- [20]武亚军. “入世式学术”生产中国本土管理知识: 重剑无锋, 大巧不工[J]. 管理学季刊, 2020(11): 15-16.
- [21]Van de Ven. Engaged Scholarship: A Guide for Organizational and Social Research[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9-10.
- [22]Timothy ,Bewes. Cynicism and Postmodernism[M]. London: Vero, 1997: 48.
- [23]习近平. 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EB/OL]. 新华网,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5/18/c_1118891128.htm, 2016-05-18.
- [24][加]伊夫斯·金格拉斯. 大学的新衣? ——对基于文献计量学科研评价的反思[M].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9: 46.
- [25]Wayne Simpson, J. C. Herbert Emery. Canadian Economics in Decline: Implications for Canada's Economic Journals[J]. Canadian Public Policy, 2012(4): 445-470.
- [26]李学勤. 交叉学科与文科的发展[J]. 科学中国人, 2003(11): 10.
- [27]钱乘旦. 文科为什么要交叉——兼论知识发展的一般规律[J]. 文化纵横, 2020(5): 134.
- [28][29]徐 贲. 阅读经典: 美国大学的人文教育[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407, 387.
- [30]于 杨, 尚莉丽. 新技术革命背景下新文科建设的价值指向与路径探索[J]. 教育理论与实践, 2021(21): 3-6.
- [31]许纪霖. 公共性与公共知识分子[M].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3: 29.
- [32]尤西林. 阐释并守护世界意义的人——人文知识分子的起源及其使命[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 212.
- [33]贺雪峰. 注意社科研究“内卷化”倾向[N]. 环球时报, 2020-08-26(15).
- [34]陈 凡, 何 俊. 新文科: 本质、内涵和建设思路[J]. 杭州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0(1): 8.
- [35]王文典. 何谓“新文科”? [N]. 中华读书报, 2020-06-03(5).

From Disciplinary Scholarship to 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The Basic Rationale for New Liberal Arts Construction from Perspective of “Engaged Scholarship”

LI Peng - hu

(Shenzhen University, Shenzhen 518060, China)

Abstract: The outstanding feature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raditional liberal arts is the emphasis on the division of disciplines, which is based on the internal logical structure of the subject knowledge and the logic self-consistency of the subject knowledge system. Its research tendency of separating the subject structure and splitting the mindset brings many challenges to the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liberal arts. As a research paradigm, “Engaged Scholarship” advocates to respond to and solve complex problems in local practice as the logical starting point, and maintain interaction and cooperation with practitioners, multidisciplinary practitioners, and policy makers in the research process to jointly produce high-quality local knowledge system.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new liberal arts can appropriately draw on the paradigm of “Engaged Scholarship”, which could help liberal arts explore new growth points through interdisciplinary, improve academic efficiency and rebuild the publicity of liberal arts academics, and focus on the Chinese context to strengthen the local awareness of liberal arts research.

Key words: disciplinary scholarship; 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engaged scholarship”; construction of new liberal arts